

本书名中的“凡夫俗子”没有贬义，只是取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对应而已；本书作者，经济学家黄有光，说自己也是凡夫俗子。

黄有光◎著

从**诺奖得主**
到**凡夫俗子**的
经济学谬误

黄有光◎著

从诺奖得主
到凡夫俗子的
经济学谬误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黄有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309-08267-8

I. 从… II. 黄…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8289 号

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

黄有光 著

责任编辑/王联合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171 千

201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100

ISBN 978-7-309-08267-8/F · 1722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经济学的中文误译

先说明,本书名中的“凡夫俗子”并没有贬义,只是取其与“诺奖得主”的对立而已;笔者也是凡夫俗子。

经济学名词的中译,有许多是译得很好的。然而,既然本书是谈谬误的,就只谈误译的地方。最让笔者气得七窍冒烟的误译,是把 dollar 译为“美元”。记得多年前,当笔者第一次读到译者的这种误译时,生气到写信骂他们崇美。措辞过于严厉,以至于笔者在第二天又发电子邮件,向他们道歉——自己措辞太强硬。后来发现几乎每位译者都是这样译的。然而,笔者依然认为这肯定是误译,只是这个错误被一般地接受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措辞太强,可能又须道歉!)

像“扑朔迷离”这个成语,用来形容复杂或模糊而分辨不清,肯定是与原文“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意义正好相反的误用(原文是说可以根据“脚扑朔”与“眼迷离”来分辨静坐中的雄、雌兔;傍地走的兔子,就分辨不出雄雌,就像在打仗的花木兰看不出是女子)。对“扑朔迷离”的纠正,已经来不及了;对误译 dollar 为美元的纠正,希望还来得及!

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新加坡元等等,都是元,都是 dollar; dollar 未必是美元。在美国,讲 dollar,就可以是指美元;



就像在中国,讲国语,就是指中国国语一样。但是,不在美国,讲 dollar,只能够是指一般的元,不可以当成“美元”。难道美国佬还需要我们替他们加强他们在各方面的领导甚至是统治地位吗?! 真是岂有此理!

General equilibrium 一般译为一般均衡。这显然是误译。“一般”是和“特殊”对应的。这里应该译成“全局均衡”,和“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对应。Real income 一般译为实际收入。这也是误译。实际是和虚假对应的。应该译为“实值收入”,和“名目收入”(Nominal income) 对立。但一般上人们又把“名目”称为“名义”。welfare 一般译为“福利”。本书用“福祉”,以强调其主观感受的含义。

Impossibility theorem 有时被译为“难能定理”,就像量子物理学的 Uncertainty principle 被译为“测不准原理”一样,是错误的,有误导性。Heisenberg 不确定原理是事物的固有性质,而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或衡量不精确。译为测不准原理,好像事物本身是确定的,只是我们量测不准。如果是这样,并不奇怪。然而并非如此。剑桥大学应用数学与理论物理学研究教授 John Barrow 说,“并非状况本身有固定的位置与动量,只是因为 在衡量它时改变其情况,而使我们不能确定;而是当我们进入量子体系时,古典的位置与速度的概念不能够共存”(Barrow 2000, pp. 203-204)。(关于量子物理诡异性,详见笔者的《宇宙是怎样来的? 宇宙是被创造的;创世者是进化而来的——公理式“进化创世论”》一书。)同样地,社会选择理论中的不可能定理,给定其条件,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并不是难能而已。

有些论点与例子可能在本书不同章节中同时出现,并非失误,只是与不同谬误有关。毕竟有些读者未必读全书。有些章节,取材自笔者以前发表过的文章。其他多数取材自笔者于2011年发表的英文书 *Common Mistakes in Economics*,但多数并非直译,而是自由书写。其中有增减的章节,并不完全一样。梁捷协助改进一些措辞,顺此致谢。

由于本书讨论许多有关经济学的谬误,在下面两篇代序中,先谈谈笔者对正统经济学的看法,也许可以避免许多误会。

代序一 正统经济学的威力、局限与拓展

1. 什么是正统经济学的核心？

正统经济学有系统地与严谨地(多用数理方法)分析消费者与生产者在约束条件下极大化的理性行为,及其相互关系所达致的均衡(尤其是有关资源配置方面)与其性质,以及均衡的变化或比较。包括下述要点。

1.1 约束条件下极大化

1.2 理性

1.3 资源配置(相对于制度、组织)

1.4 均衡(相对于非均衡与历史)与其性质,尤其是关于是否帕累托最优

1.5 多数学者强调市场的效率与政府的无效率

一般地,假定消费者极大化的是代表其偏好的效用,而且假定效用只是消费者自己所消费的消费品数量的函数。约束条件则是总支出不能超过消费者的预算或收入。生产者则假定是把利润极大化,约束条件是受现有技术影响的生产函数。个别消费者与个别生产者都假定不能影响由整个市场的供需均衡所决定的产品与生产要素的价格。



2. 正统经济学的长处

经济学被称为社会科学中的女皇，自有其长处，包括：

2.1 针对经济行为的重要方面

2.2 有很严谨的分析与很多具有洞察性的结论

2.3 约束条件下极大化的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分析非正统的因素；将来也会很重要

其实，正统经济学对分析现实经济以及社会人生的许多问题，都有很大的可用性。对于经济学者，这是不需要重复的。因此，笔者针对短处多谈一些，请不要误以为笔者认为正统经济学一无是处。

3. 短处

3.1 许多经济学者迷信简化模式。即使是很不现实的简化模式也并非全无用处。例如，力学中关于没有摩擦力下的物体运行，对有摩擦力的现实世界也有用处。但我们不可以迷信简化模式，把简化模式应用到现实世界时必须考虑现实世界的复杂因素。迷信简化模式的情形，可由一个例子来说明。多年前，我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有一位主讲者说，大约 3% 的温和物价上涨是有好处的，因为偏好与技术等变化，不同行业需要调整，包括人力在内的资源必须从萎缩行业转移到成长行业。要达致这种转移，萎缩行业的工资必须下降。如果物价不上

升,必须降低名目工资。但人们对名目工资的降低,抗拒力较大,不如维持名目工资不变,通过物价上涨来使实值工资下降。有一位参会者发问道,“这是不可能的,不论实质工资是通过物价上涨或名目工资下降而下降,其对消费与效用的影响是一样的。对名目工资的降低,抗拒力较大,是不理性的。”笔者自认为是理性水平非常高的人,但他也是对名目工资的降低,抗拒力较大的人。与其说这是不可能的或不理性的,不如说经济学常用的效用函数,只考虑自己消费品的数量,忽略了可能影响人们效用的其他因素,包括名目工资的下降会被人们认为更不可接受(相对于实质工资通过物价上升而作同量的下降),不论这是由于面子问题或其他原因。与其说人们不理性,不如说经济学的简化模式忽视了现实世界的一些有关因素。

3.2 简单的经济分析忽视了许多重要因素,如:相互攀比、环保、不完全理性、制度、文化等。有许多重要因素,得到一些经济学者的重视,或在某些部门被研究,但在主流经济学中仍被忽视。例如,竞争的不完全性在实际经济中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例如你问一百家厂商,给定现有价格不变,如果能够卖出更多,是否要卖出更多?至少有九十多家会求之不得,他们都不是完全竞争者(均衡下的完全竞争者不愿意多卖)。正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尤其是关于产业组织的,分析过竞争的不完全性。但在全局均衡分析与宏观经济学中却基本忽视竞争的不完全性。笔者在1980年前后,把竞争的不完全性引入宏观分析,把微观、宏观与简单的全局均衡分析结合起来,就得出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结论以及其他此前没有人(包括笔



者自己)想到的情形都是特例的结论。

3.3 过分的数理形式主义。数理分析肯定对经济学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若有需要,笔者自己也用不少数理经济分析,并往往除了证明原来的想法,也得出原来没有想到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学者,尤其是研究生,绝对应该加强数理与计量的训练。不过,笔者也非常同意吴敬琏老师强调的观点,很多人盲目追求前沿,但却没有把基本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搞好。我的经验支持吴敬琏老师的观点。我在国内外,包括美国名校,问研究生或研究生候选人本科生水平的基本微观经济学的东西,绝大部分不会回答。基本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东西,是分析、讨论现实经济问题与作经济政策建议最重要的工具,比高深数理理论重要得多。像建一间屋子,如果地基都烂掉了,把门窗装修得金光闪闪,又有什么用呢?

笔者在《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中译本于200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引言与附录B中举例说明,很多用复杂高深的数理分析得出的结论,实际上用一个简单的图形,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而且其原因更加一目了然。但原文如果没有用高深数理分析,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在第一流期刊发表。对此,学术期刊的编者与审稿者们,应该有所反思。

关于过分的数理形式主义,我还有一个故事。多年前,我到牛津大学访问。在一个聚会上,我问另一位经济学者,“你是研究什么方面的?”他说,“我研究 SP-SPACE。”我问,“什么是 SP-SPACE?”他说,“你不知道什么是 SP-SPACE?”,好像每个经济学者都应该知道什么是 SP-SPACE。我说,“我只用欧氏空

间。”“Euclidean space is OK.”言外之意，好像欧氏空间太简单了。过后，我也没有去查什么是 SP-SPACE，SP 是否是 sexy and pedantic？因为我肯定，用欧氏空间已经足够了。其次，作为经济学者，即使需要用到什么特殊数理方法，这应该只是一种工具，而不应该是研究课题。

另外有一次，笔者批评一位知名经济学者的模式不现实，他的辩护竟然是：“我不认为我的模式与现实世界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把经济学变成数学游戏吗？但是，作为数学，他们的分析既不高深，也不是很有趣。

作为曾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等非常重视数理方法的一流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的人，笔者对过度形式技术主义的批评，希望不会被认为是酸葡萄的观点。

4. 将来应该如何拓展？

4.1 现实重要性比严谨性重要。提高分析的严谨性，当然是学者的追求。不过，我宁可对重要问题有一些大致甚至是模糊的答案，不要有对无关痛痒的问题有非常精确的答案。对人们的银行账户的最后五个号码与他们的身高或体重或身份证号码的相关性，可以进行非常精确的分析，但有什么意义呢？

4.2 吸纳非正统研究的成果：制度、文化、行为与试验经济学、快乐研究等。实际上，经济学及经济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不过教科书与其他经济学者没有赶上。例如，



现在教科书与许多经济学教授还在教导学生,效用只有序数性,没有基数性,也不能进行人际比较。对消费或需求理论以及全局均衡分析,序数效用已经足够,不必假定效用的基数性。根据 Occam 剃刀的原理,应该把基数效用的假设剔除。但是,在社会选择上,非得有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不可。大师级的经济学者,包括诺奖得主如 Harsanyi、Mirrlees、Sen 等,几十年前就用了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分析,例如, Mirrlees 1971 年关于最优收入分配的得奖作品。在应该应用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分析的领域坚持剔除效用的基数性,就像有人留胡须,你坚持他必须把胡须剃掉,因为吃饭不必用胡须。但他留胡须,未必是用来吃饭的,可能是要增加他的男性魅力!

4.3 由于影响经济变量的因素很多,常理与综合的能力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政策上。多年前,当北大教授王建国还是我的博士生时,他做了数理分析,得出某外生变量对某内生变量的影响是负的。我从常理或直观上看,认为应该是正的,对他说,你可能漏掉一个负号,回去查查。几天后,他回来说,查过了,没有错。我说一定是错的,回去再查。第三次他回来说,查了很多次了,没有错。我又坚持说一定错。那次他大发脾气。(我后来说起这事,说他拍桌子。王建国否认有拍桌子,只承认发脾气,大声说话。)他说,“你又没有计算,硬说我错,哪里可以这样打压我。我最多回湖南农村种田,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也不能受你这种无理欺负。”我大吃一惊,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激烈反应。我也完全没有打压他的意思,就对他说,“你不要太激动,不需要回湖南。错肯定有错,慢慢查。”他见我口

气温和,也就不再发脾气。第四次,他说终于查到漏掉一个负号,结论应该是反过来的。(我第一次书面谈及这件事时,没有说明王建国的名字。他读到后对我说,其实你可以说出我的名字。)

关于漏掉负号,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位诺奖得主,多年前未得奖时,在牛津大学主讲研讨会上说,“我证明过很多法西斯(极端右倾)定理,今天很高兴能证明一个左倾定理。”结果 John Flemming 发现他漏掉一个负号,改正后,又是一个极端右倾定理。

关于王建国,为公平或平衡起见,应该指出,以我所知,他是唯一能挡我的“撒手铜”又令我对其诗词甘拜下风的人。我的所谓“撒手铜”其实并不可怕,只是几个本科生一二年级基本经济学的问题,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研究生不会回答,包括多数一流大学的一流研究生,所以才叫做“撒手铜”。但王建国能回答。我原来自以为诗词写得不错,但看了王建国的诗词,自知相去甚远,甘拜下风。

有两个显然的候选人,可能可以使王建国的唯一性被推翻。一个是厉以宁教授,另一个是张五常教授。厉以宁教授虽然没有出国留学,但对现代经济学有很深广的认识与论述,又在思想上对中国经济改革作了重大贡献,其诗词集也令我甘拜下风。张五常在佃农理论等领域有重要论述,对产权与市场的重要性,结合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写了许多深入浅出的文章,令人拍案叫绝,虽然某些观点可能有些偏激。我没有看过张五常的诗词,但他的书法和摄影都令我甘拜下下风。像厉以宁和张



五常这样的天才，挡我的“撒手锏”应该是游刃有余。不过，我虽然同他们两人有过多次交往，却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胆量向他们抛出“撒手锏”。因此，我只能说，我相信他们能挡，却不能说，我知道他们能挡。因此，王建国的唯一性依然成立。

另一个可能候选人是杨小凯。他在经典的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有系统的分析上，建立了突破传统经济学的新框架，对中国改革的深层问题，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虽然有些观点也显然非常偏激，甚至有很大的盲点。不过，和王建国与张五常等多多少少有些“不务正业”的学者不同，杨小凯把所有非闲暇时间以及原来应该是闲暇的时间都从事正业，我不知道他在文艺上有什么兴趣。另外，像林毅夫、刘遵义、钱颖一、田国强、张维迎、周林、邹至庄等大师或后起之秀，虽然和我相识，但我对他们在经济学以外的兴趣，还没有足够认识，未能评论。

关于综合各种有关因素在政策上的重要，可以考虑汽车的例子。多数经济学家只考虑拥挤，得出新加坡对汽车的控制过严。但还应该考虑污染、炫耀性消费（部分导致钻石性物品的作用），人们由于天生累积的本能与受商业广告的影响而有过度的物质主义。新加坡对汽车的控制未必过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对汽油与汽车抽重税，而应发展公共交通，避免陷入曼谷那种骑虎难下的情形。

4.4 折中主义。例如，兼顾资源配置与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不可说资源配置的问题很重要，就认为分工的问题不重要；反之亦然。再如兼顾市场经济的重要与局限（尤其对环保）。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肯定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非常支

持中国的改革。不过,产权与市场虽然非常重要,却非万能。例如生产与消费上的外部作用,尤其是对环境的破坏,必须用政府的税收等政策来补救。有些极端右倾的经济学者,完全否认外部作用的存在。当我举事实来反驳时,他们说,即使外部作用存在,还是假定不存在好,因为让政府来处理往往把事情搞得更糟。这对某些外部作用来说,可能是对的;不过,对于已经威胁人们健康与人类生存的环保问题,非有有效的公共政策不可。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应该重视经济发展,将来有钱了,才来搞环保。当然,用于环保的投资,受到经济水平的限制。不过,有几点必须强调:第一,有很多情形,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补救的,或者将来必须用许多倍的资源才能补救。第二,有些情形,对环境的破坏不但影响人们今后的福祉,也影响经济生产。第三,环保不一定要有大量的政府投资,也可以通过破坏环境的活动加以课税(或收费)或限制来实现,但这也依赖于一个有效与贪污程度不是太高的政府。

4.5 在把经济学应用到政策上时,要考虑到人们的福祉或快乐的终极目标。当然,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实证科学,但它经常被用作政策建议。当涉及政策时,必然牵涉价值观。价值观的问题虽然和科学问题不一样,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能讨论。我认为人们的终极目标是快乐。因此,当不涉及他国与动物的时候,政府的政策应该把人民的长期福祉(即快乐)极大化。不过,多数经济学者只谈偏好(或效用)而不谈快乐,这是不够终极的。多数经济学者也怀疑快乐的可衡量性与人际可比较性。



当然,这有困难,但并非不可能。经济学者也应该看看自己的后院。国民或国内总产值是用了成百年的最主要的经济变量,但一考虑购买力水平,中国的国内总产值必须增加四倍,印度必须增加六倍。快乐的衡量,虽然不很准确,但我想不必调整四倍!

4.6 在中国的情形,这一二十年来,对现代经济学的掌握已经有很大的进展,现在更开始争取进入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这当然是可喜的。百年树人,即使要到几十年后才赶上前沿,也有必要早日开始。不过,除了要注意上述各点,还要认识到,现在中国经济学研究最主要的任务是如何把正统经济学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分析出适用于中国的现状的结论。关于中国的现状的一些特点,包括文化与制度上的,例如东西文化差异、守法程度的差异、党政主导经济的程度等;也包括中国现在转型期的一些特点,例如国企以及与之有关的金融问题,城乡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巨大城乡差异等。当然,研究上也有分工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人从事纯理论的工作,一些人从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李维森教授所主张的“为学问而学问”的工作(但作为所有学者的方向,我则不能同意)。知识的累积,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用处。

完稿于2004年元月12日

(本文根据笔者于2003年12月底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致词补充改写,发表于《比较》,第11辑。)

代序二 经济学的性质

——分辨实证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的不同

韦森(李维森)在“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文(下称韦文)中严谨地讨论了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等问题,这是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现代经济学研究开始起跑时的重要问题,特此参加讨论。

韦文大约包括下述几个要点:

1. “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的本质、任务和意义的理解和把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2. “经济学不能超越伦理学而做到价值中立。”

3.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显然离不开功利主义的经济和伦理的‘计算’,但把功利主义作为它的唯一基础,显然也会带来许多问题。因为,功利主义内秉着许多它自己的无法摆脱的许多理论困境。”

4. 当代经济学,“由于太注重形式和技术,从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经济学的‘经邦济世’的历史的使命和现实的意义。”

5. “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过度)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只